

## 一、前言：機動化社會的速度暴力與生命政治

當代掀起一波慢活運動，但對於緩慢生活的嚮往，顯然正好標誌了加速移動是難以逆轉的社會趨勢。無論如何爭議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社會特質，過去 500 年來似乎有難以辯駁的更深遠動態，也就是許多學者以加速(acceleration)、流動(flow)、液態(liquid)、移動(mobile)、即時性(immediacy)、時空壓縮(time-space compression)、流變(becoming)、轉瞬即逝(transitory)等概念試圖掌握的歷史變局(Bauman 2000, 2007; Castells 2000; Harvey 1989; Hassan 2009; Tomlinson 2007)。

當然，人類並非永遠無法停頓下來，移動也總是仰賴穩定的基礎設施(infrastructure)、政治制度及社會關係，因而有流動和固著(fixity)的辯證，並體現為加速與減速的速度調節，或者說，速度的部署。人類社會的速度調節和部署，取決於眾多異質元素之間的密切配合，從而要求某種有利於相互搭配的穩定性。這種穩定性不僅有助於調節減速和加速，也著眼於確保安全，避免差錯。穩定性對於速度導致的不確定、難以預測、風險、意外及災難，乃是必要安全裝置。但是，若是過度強調安全和降低風險，也會導致穩定性過高，反而陷入僵化停滯，有害於加速與流動。穩定性既是加速的條件，又是加速造成之危險的防禦裝置，但也可能是持續加速的阻礙。

於是，加速、減速和穩定狀態的調控，是社會變遷的核心機制，也是社會治理的重大難題。經濟持續增長會導致景氣過熱、物價騰貴，從而減緩消費並導致經濟走勢逆轉、社會不安，因而需要持續調控（無論是通過政府干涉，或訴諸市場訊號）。文化轉變趨勢加快，藝文風格不斷推陳出新，致使記憶、習慣和認同難以追隨，甚至造成斷裂感，於是懷舊產品大為盛行，亦即透過時間性(temporality)的複雜化來調節文化的加速變化。追求速度的各式交通系統，也因為速度帶來意外和焦慮，而重

視穩定與安全。

但是，即使有穩固的速度技術系統、基礎設施，以及愈來愈全面、多重保障的安全治理，但技術系統的日趨複雜仍不斷增添不確定性，以及多重介面協調導致的風險。Paul Virilio 便曾指出技術與意外(incident)的內蘊關係：

船的發明便已導致船難的發明。蒸汽引擎、火車頭的發明，也必然導向脫軌與鐵道災難的發明。……每個技術革命的時代，伴隨著一套工具與機械，都牽涉了特定意外的出現，顯露出科學思想成長的負面。(Virilio 1996/2000: 54)

Virilio(1977/2006)長期關心速度與社會發展的關係，提出「競速學」(dromology)研究取向，嘗試從「速度體制」(dromocracy)來探討歷史變遷、技術、政治、戰爭、支配與抵抗等議題，特別關注持續加速的後果。這個速度政治的論題，結合 Virilio 對於技術與意外之內在關係的主張，配合當前加速技術的進展，我們可以想見，對速度的控制導向權力施展的支配性優勢，但也必然帶來故障、意外、災難、撞毀。這便展現出速度的多重暴力場景；既是以速度（加速）來破除防禦壁壘、鬆動體制、扯裂根著、釋放可能潛力的開創性暴力，是以速度來遂行征服、統御和壓迫的支配性暴力，也是因為速度而致生意外災難的暴力。速度暴力的多重樣態，同時增添了穩定化與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及困難度。

分析速度暴力與穩定安全的調控，有各種探討方式，包含經驗課題和分析視角的選擇，如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辯證論題、社會分工與整合、理性化等古典社會學觀點等。本研究選擇從 Foucault 的「治理術」(governmentality)觀點切入，並以台灣的道路交通安全治理作為經驗課題，相較於古典社會理論的宏觀視野和對於科技物(technological object)的輕忽，提出接壤技術議題，特別是基礎設施的中層分析(meso-analysis)。